

解决产能过剩需要长效机制

张茉楠

近期,发改委、工信部正牵头调研制定化解产能过剩总体方案,重点将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造船五大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这标志着“去产能化”大幕正式拉开。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疲弱的消费需求严重制约了发达国家的复苏进度,其家庭资产负债表遭受严重损害,居民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既往的负债型消费模式。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难补上,全球经济都呈现出总需求不足的状态。受外需萎缩、贸易壁垒、通货膨胀、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出口产业受阻,激化了外需产业的产能过剩矛盾。

但产能过剩并非此次危机独有。产能利用率是考察产能过剩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经验,当工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5%以上时,代表设备使用率接近全部;当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表示设备闲置增多,产能过剩出现;

开工严重不足。据统计,1996年末全国28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有4成处于闲置状态。据国家统计局1998年对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普查,多数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仅有10%。

二是2005年以来,新一轮产能过剩问题凸现。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5年底有11个行业产能过剩,其中钢铁、电解铝、汽车等行业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等行业也潜藏着产能过剩问题。

从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既存在市场性“过剩”,也存在体制性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资金和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

此次产能过剩比以往更严重。产能利用率是考察产能过剩的重要指标。根据美国经验,当工业产能利用率超过95%以上时,代表设备使用率接近全部;当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表示设备闲置增多,产能过剩出现;

工业产能利用率在81%及以上时,为正常的产能过剩,低于81%时,为较严重的产能过剩。

与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相比,我国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从局部行业、产品的过剩转变为全局性过剩。在我国24个重要工业行业中,有19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电石、水泥等重工业产能过剩都是比较严重的。2012年,中国产能利用率为57.8%,这要远远低于1978年以来中国的产能利用率达到72%~74%的平均水平。

笔者认为,治理产能过剩,除了通过企业破产、并购和重组等压缩生产能力,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等常规方式外,还应该从源头上入手进行顶层设计,按照“多方齐下、标本兼治、改革推动”的原则,建立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首先,推进深层次改革,加快启动内需。产能过剩背后是“生产过剩”,根本是分配不均造成的,巨大的投资需求没能与最终消费形成良性循环,因此,还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刺激国内消费等调整生产能力和平扩需求的方式来实现。发展内需,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和购买能力。正确处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扭转最终消费率低的现象,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调整投资结构,引导投资向为扩大居民消费方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其次,加快产业资本“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势在必行。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中国要实现

在国际上的“高位渗透”的目标;其一,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可以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其二,加快汽车行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一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车行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也就是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

因此,加快汽车行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第三,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最后,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干预和控制。1994年财政分权改革以后,我国地方政府出现明显的“公司化”趋势。地方政府直接介入经济、承担企业经营管理角色的趋势,且各级政府与所辖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能过剩,也导致了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降低,这是导致产能扩张的体制性原因。因此,抑制中国式产能过剩必将成为减少政府对GDP的直接控制和干预,进一步简政放权,不能让“看得见的手”变成“闲不住的手”。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焦点评论

大资管时代 应遵守客户体验至上原则

储著胜

近日有两则新闻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其一是有基金公司正引入“绝对收益”的考核方法来考核基金经理;其二是有证券公司已采用“客户资产增值”作为经纪业务的考核指标。

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都是财富管理的主力机构,其动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管领域的演变趋势。上述考核指标的设立明确告诉人们:在大资管时代,随着行业竞争的加剧,客户体验至上原则开始受到财富管理机构的重视。

综观我国过去多年资管行业的实际情况,客户体验整体上是很糟糕的,不管是银行、保险,还是基金、证券,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相比之下,基金、证券行业问题尤其突出!

就基金公司来说,过去一直用相对收益指标考核基金经理。这一指标的长处是能鼓励基金经理相互展开竞争,以获得好名次,但其负面作用也很明显,即容易刺激基金经理过度追求短期收益,使基金本应具有的长期投资特点在我国几乎消失。更让基民深受刺激的是,在熊市基金竞相亏损的时候,仍然有一大批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获得这样或那样的奖项——只因他们比别人亏得少。除此之外,一些基金公司还为了能获得更多管理费收入,完全不顾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水平,拼命扩大基金发行数量和规模。结果在一段时期内,基金的规模确实上来了,但基金的净值却下去了,基民因此深受其害。

证券公司也一样,长期养成的习惯是,拉来的客户和资金数量越多越好,客户资金的成交金额越大越好,经纪人员的收入只与其拉来的资金数和成交量挂

钩,至于这些资金最终是赢利还是亏损以及亏损多少他们就毫不关心了。这种考核方式所导致的结果是,经纪人员在拓展客户阶段会使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进行恶性竞争,在拉来客户之后又通过各种方式诱导和刺激客户频繁交易,因为交易量越大,他们获得的提成就越多。

上述情况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财富管理机构缺乏一个以客户利益为参照的考核指标。这一核心指标的缺乏,不仅会严重侵害客户的利益,而且也容易使自己丧失长期发展的基础。最近几年,这些机构遭受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无视客户的利益最终将被客户所抛弃!

随着金融业对内不断开放,金融各

上海保险中介巨头女高管携巨款潜逃



泛鑫高管携款逃,保险公司惨中招。
为揽客户给返点,哪知中介玩骗保。
规模扩张太迅猛,风险防范不牢靠。
庞氏骗局处处有,大意必挨下一刀。
ICLONG/漫画 孙勇/诗

过度攫取“控制权收益”不能听之任之

熊锦秋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对李勤夫与海航系之间有关ST九龙股权转让款支付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李勤夫胜诉,海航系应付5.34亿元及违约金1000万元。据称海航系早已将16.9亿元的代价付清,这5.34亿元是李勤夫单方面提出的控制权交易款。由此看来,控制权也可单独卖钱么?这涉及“控制权私有收益”这个概念。当控股股东获得公司控制权时,他们倾向于利用这个权利,来得到与其持股比例不相称的、比一般股东多的额外收益。比如,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以“隧道挖掘”方式转移公司资产和利润,或非法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或利用上市公司的名义进行各种担保和恶意融资,或为高管提供不

合理报酬和在取消消费,或进行内幕交易等,从而获取隐性收益。显然,这部分隐性收益等于是通过对小股东进行侵害而获得。

目前,A股市场对借壳上市敞开缺口,场外企业可从垃圾股公司大股东手中受让股票,进而获得上市公司控股权,从而对公司进行资产注入等借壳上市操作。这对场外企业好处甚大,垃圾股公司的控制权蕴含的“控制权私有收益”,更是甚为可观。

大股东只要获取了公司控制权,就与其他股东形成质的区别,由此带来额外的利益。有时,两个大股东或几个大股东争夺股权,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获得控制权,从而享受控制权“私有收益”。由此,转让控制权与转让小量股权有所区别,在定价时一般就要考虑“控制权溢价”。即使暂时允许借壳上市,也有必要对“控制权溢价”

有所限制,要防止卖壳方漫天要价,防止壳价格水涨船高,因为这些所有的“沉没成本”,最终都需要市场和其他投资者来消化承担。

对中小股东来说,关键是要克服“搭便车”思想,通过采取投票权征集等方式,从而对控股股东进行有效制约,防止其以“隧道挖掘”等方式掏空上市公司。而且,只要散户高度团结,控股股东“控制权溢价”也会自动降低。例如,如果某公司30%股权可视为控制权的话,那么散户只要有30%以上的股权联合在一起,控股股东30%的股权就得靠边站,那么这个这个控制权也就无法单独待价而沽了。

在一些股权高度分散的公司,有的大股东持股还不到10%就可对公司形成实际控制,就可为所欲为,一大群散户犹如待宰的肥羊任其宰割,除了应该责备大股东外,对这群毫无作为的“沉默的羔羊”,我们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健康产业 将成为中国经济新亮点

李佐军 魏云

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持,特别是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以预防为主,把着眼点放在健康上,完善国民健康政策”,健康产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将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

促进健康产业“健康发展”,一是要加强健康产业的顶层设计。在健康产业的热潮下,许多地方与企业都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无序开发、重复建设等现象比较普遍。因此,应当尽快加强统一的行业管理,制订《国家健康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构建科学的健康产业体系和产业布局结构,使健康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的新增长点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方向。

二是要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当前我国健康产业法规不完善,相关标准体系滞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医疗信任危机,食品安全、保健品过度宣传等问题严重,导致消费者对中国健康产业的信心不足。因此,必须通过完善法规、提高标准、加强执法等措施,着力维护健康产业良好的市场秩序。

三是促进健康产业的创新发展。首先是文化创新,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养生文化,与现代文明、健康理念和生活方式相融合,形成现代的健康文化;其次是科技创新,促进高科技产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改造提升传统健康产业,创新发展数字健康、远程医疗、基因检测等新兴健康产业;最后是产业服务创新,促进健康产业由医疗保健为主向健康管理为主转变,衍生出多样化、多层次的健康服务业,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健康服务发展模式。

(李佐军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魏云系北京城乡创新发展博士研究会会长)

反垄断 就要敢于“打老虎”

江德斌

享受着垄断暴利,却没有接受过反垄断调查,致使民众积怨甚多,呼吁对其进行反垄断制裁的声音一直不断。此次国家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的表态,无疑是一次正面的回应,预示着发改委反垄断调查将进一步深入下去,不仅要“打苍蝇”,还要“打老虎”,各垄断行业均有遭到调查的可能。

至于重点谈到银行问题,则也是事出有因。在金融海啸冲击之后,这两年整体经济形势欠佳,许多行业步入低迷阶段,企业效益下滑,甚至亏损倒闭。但是,银行却鹤立鸡群,赚钱都赚得不好意思了,在上市公司净利润里面,银行占比居然超过一半,有挤压实体经济之嫌。银行借助垄断优势,抬高融资成本,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已经影响到整体经济的发展,此种局面必须予以扭转。

当然,除了银行之外,其他垄断行业的负面影响也很大,甚至危害性比银行还要大,民众苦之久矣。由于各大垄断行业根基很深,对政策的影响力很大,虽然改革口号喊了许多年,但至今都未能打破垄断格局,行业进入门槛仍未放开,垄断利益已经固化,改革阻力非常大。因此,发改委要想对它们进行反垄断调查,就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勇气,敢于顶住既得利益者的压力,以“打老虎”的气势进行反垄断,从而真正破除垄断格局。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11@126.com。